

略论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华文化传承

■ 白丹妮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530007)

【摘要】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在马来西亚特殊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历经适应性调试后,呈现出有别于原乡的文化形态,本土特色鲜明,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拟从文化传承视角出发,在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形态的基础上,分析其传承的原因,审视其面临的处境,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在中马两国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5)08-0070-04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5.08.020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海上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便是移民迁徙的主要目的地。根据考古研究,早在公元前后,华人就在马来世界留下踪迹。随后,在中外古籍如《岛夷志略》《诸蕃志》《马来纪年》等文献中,均有关于华人移民流连马来地区定居、经商的记载。晚清时期,由于中国华南一带地瘦人稠,战争与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殖民者经济开发的需要,出现了大批闽粤百姓移民马来半岛的热潮。据估计,1881-1930年间到达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约为830万人^[1]。随着新移民的大量南渡,中华文化被带入并广泛传播,深深扎根于马来社会,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本土色彩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那么,中华文化为何能够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马来西亚华人又是如何保留并发扬这些文化传统?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应以何种方式开展马中双边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长效传播呢?鉴于此,有必要对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华文化传承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以提升我们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了解,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

一、华人文化传承的主要形态

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华社的传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概而论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具体论述如下:

一是混合型传承。峇峇娘惹文化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传承代表。峇峇娘惹又称土生华人,泛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马六甲、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一带的明朝人和当地马来族妇女结婚后所生的后代,男性被称作峇峇(Baba),女性则被称为娘惹(Nyonya)^[2],与大批在中国出生而新移入的华人华侨相对,他们是华人社会中土生土长的特殊次社会群体。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于殖民地政府;在文化上糅合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及欧洲文化于一体,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混血”文化。尽管其文化中掺杂了多种文化元素,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诸多承袭至今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名字上,峇峇娘惹依然保留了华人的姓氏,并沿袭了中国人的取名习惯,虽然已经很少有人懂得他们的中文姓名拼读,更多用闽粤方言拼写代替,但

其中仍然有不少人熟知其姓名的寓意；在日常生活中，峇峇娘惹族群仍保留着大量的中华传统习俗如披长袍、穿布鞋丝袜、戴布帽、留辫子及社会礼仪、婚姻丧葬、祭拜祖先等，几乎完全依据着中国的传统方式^[3]。此外，在手工艺术领域，娘惹们亦常常使用中国民间风俗中特有的八仙、十二生肖图案进行珠绣创作……名目繁多的礼俗体现着该族群对中华文化传统执着地坚持和追求。

二是延续型传承。延续型传承具有覆盖面广、形式内容复杂多样的特点。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中，广泛流传着的华人文化大多承袭自其祖籍地的文化。然而，鉴于马来西亚当地与祖籍地气候条件、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这些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本土环境。部分文化在形式上虽有所创新，却依旧坚守着传统的文化精髓，例如宗族活动在敬宗收族的形式上虽有所变动，但依旧维系着祖籍地的文化内核。另外，一些习俗则因气候、地理环境变化而变化，如除夕围炉的传统在马来西亚并未得到完全保留，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改良原乡元宵节“抛柑”风俗，独创“抛香蕉”“抛榴莲”、互换联系方式等新型“抛柑”民俗。此外，部分文化习俗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例如红白喜事，如今它们不仅承载着古代农村的传统礼俗，在华人社群中还承担起了筹集文化教育经费的新功能^[4]。但万变不离其宗，此类文化传承仅改变外在形式，内在本质大都始终如一。

三是重构型传承。重构型传承，顾名思义，是指在继承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展开文化重构，进而创造出全新文化的过程。古庙游神民俗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就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大例证。根据柔佛古庙建立的历史背景，可推知马来西亚新山古庙游神多源自中国潮汕地区“营老爷”民俗，是一项民众为祈愿新年平安、兴旺发达所举办的神灵祭祀庆典。如今，在马来西亚却有另一番发展光景。不同于潮汕非统一的地方性神灵崇奉及游神仪式，马来西亚柔佛古庙首创“五帮共庆”的游神格局，仅供奉洪仙大帝、玄天大帝、感天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五尊主神，并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发展需要将上述神明分别交由潮州、福建、客家、广肇、海南“五帮”各自负责奉祀出游。同时，在游神活动中植入马来查宾舞、神马舞、印度舞、锡克舞等多元族群表演文化，将传统游神活动打造成了跨族群、超方言群的本土化神人嘉年华盛会，在马来西亚成为华人族群文化代表性品牌。2012年，时任首相纳吉布亲赴柔佛出席众神夜游活动，颁布国家文化遗产证书，并宣布将柔佛古庙游神盛会列入州政府工作日历中，成为该州主要旅游项目^[5]。自此，柔佛

古庙游神文化正式得到马来西亚国家层面的认可，成为马来西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计划向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力，这在以伊斯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实属罕见。

二、中华文化跨境传承的可能性

从上述列举的若干传承类型可知，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向心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马来西亚华人数量多，人口占比高。纵观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紧随新加坡之后，拥有全国人口中占比极高的华人群体，马来西亚华人成为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人口达3400万，其中马来人约占58%(19720000人)，华人约为22.6%(7684000人)，印度人占6.6%(2244000人)^[6]。这一数据表明，尽管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比较独立时期有所下降(1957年独立时达37.16%)，但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尤其同为海岛国家的印尼华人3%的人口比例相比较，马来西亚华人人人口规模比例还是非常可观的。

民族社会学认为：“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总人口中，每个族群所占比例是决定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人多则势重，这一因素无论在历史上凭靠武力夺取自然资源的时代，还是今天凭靠选票的多少来决定权力分配的时代，人口相对规模始终是影响族群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7]在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始终是第二大族群，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诸多华人文化传统得以在马来西亚落地并实现持续发展便与其人口优势的加持息息相关，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始终是保存文化的有利条件。

第二，马来西亚拥有较为完整、成熟度较高的华人文化传播和发展机制。首先，在华文教育领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必须通过母语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数据，目前马来西亚共计拥有约1300所华文小学、60余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4所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华文高等教育机构，展现出了坚实的教育基础与可观的规模。除此之外，还有153所国民小学及78所国民改制型中学开设有华文课程，进一步拓宽了华文教育的范围。同时，16所师范学院亦开设了中小学中文教师相关培训课程，致力于提升华文教育的师资力量^[8]。部分综合性大学如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等也设有中文系，全国学习华文学生人数众多，甚至包括一

些马来人、印度人等非华裔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这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为马华社会培养和输送大量华文知识精英，以充实华人文化建设队伍，延续文化发展传承。

其次，在华文传媒领域，华文报刊是传递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马来西亚华社共有14家华文报刊处于发行状态，包括《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与《东方日报》等，此外，还有一家专注于华文报业领域的上市企业——世界华文传媒集团。这些报纸的日均发行量接近90万份，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9]。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背景下，华文报刊除进行新闻报道外，还具有维护华人发展权益和民族文化遗产的重大使命。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Anderson)曾指出，想象的第二根源在于报纸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促使大量人群得以采用新颖且深刻的方式展开自我深入反思，并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10]。华文媒体作为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物，通过不断地报道文化相关新闻内容，持续传播族群文化符号，引领读者步入一个由报纸媒体塑造的族群想象空间，进而将此种想象转化为读者稳固的经验与记忆。因此，在马来西亚各地域居住的华人群体，通过阅读华文媒体，能够共享一套文化价值观，从而滋生出一种身为华人“族群”内部“自家人”的认同感。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华人社群内部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华人文化传承共同体的憧憬与认同。

再次，华人社团凝实团结，具有深厚的凝聚力。马来西亚华社有上千个社团，目前数量仍在增加，华人对成立社团、进行集体活动的热情有增无减。内容、形式各异的社团在维护华人文化发展权益、保护和发展华人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983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马来西亚华董事会联合总会（简称“董总”）、马六甲总商会等十几家华人社团联合起来，代表马来西亚华社表达了华人社团意见，并提出华人社团相关诉求和建议。该行动引发了热烈反响，在华人社团的积极争取下，使得华人文化在困难之时仍能拥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第三，中国的崛起及马中双边关系的增强客观上推动了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根据统计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地位的变迁尤为显著。自2010年起，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列，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不足2%攀升至当前的接近9%。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而且在世界出口产品中的占比亦有所上升，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国际经济产生的影响大约在0.1%至0.4%之间^[11]。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崛起”这一主题也在过去十年中频繁占据国际新闻报道的显要位置。中国的崛起，对马来西亚尤其是华人来说，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利好含义。在经济上，长期以来中国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两国的经贸联系也将进一步深化，这将直接有助于当地经济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在文化上，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也将带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为获取更多机会，马来西亚掀起了汉语学习热潮，更多中国文化产品被引入马来西亚，在一定程度上为华人文化传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文化传承难点与挑战

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文化发展情况，马来西亚华社有着完整高效的文化遗产发展机制，华人文化发展之路较为顺利，但也存在着一些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文化影响力有增无减，新生代华人面临文化认同难题。历史上处于社会文化发展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马来西亚历史进程、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形塑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如今，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以欧美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明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12]。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在远离中华文化母体环境中延续发展起来的，本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历经数代更替，年轻一代华人与祖籍地联系渐少，文化渊源亦在不断减弱。

二是华人社会内部有分化趋势，社团组织活动形式对青年缺乏吸引力。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来说，数量庞大的华人社团组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团数量多反映出华人集体活动意识强，参与积极性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华人社团缺乏协调合作的问题。此外，由于目前社团主要领导人普遍较为年长，且后备接班人才培养乏力，社团活动组织形式大都沿袭旧例，缺乏创新，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造成部分乡团出现后继无人、活动停滞不前的现象，若放任其继续发展下去，长此以往将对文化传承产生不利影响。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提出了闻名中外的“文化中国”理论。根据其界定，“文化中国”可划分

为三个层次不同却彼此关联的“意义世界”。

第一个意义世界囊括了中国、新加坡等共享“族群认同、语言、历史及世界观”的国家与地区；第二个意义世界覆盖了从东亚、东南亚、南亚至太平洋区域，乃至北美、欧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全球各地的华人社群；至于第三个意义世界，则广泛包含所有在国际范畴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关注中国文化现象的学者、知识分子、独立作家、媒体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与听众群体^[13]。从他对“三个意义”世界的划分中，不难发现华人在建构“文化中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马两国在开展双边合作交流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和价值观认同显得尤为必要。华人与中国在语言习俗、历史文化、亲缘血脉、经贸往来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是中外交流的和平使者。由此，我们更应积极发挥华人在双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加强与华人华侨及侨乡的联系，共享文化交流成果。

参考文献：

- [1] 梁英明.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 22.
- [2] 叶舒, 徐华炳. 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移植与适应——以南洋“娘惹文化”为例[J/OL]. 国际传播, 2018(06): 73-84(2019-01-22) [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GwRDUUqDs6iE9LyQDVUVIvnrS29iys-6fGejsT6xYFao2UgI0pgTwZ-EHXbKbBK4ftGYpWcRNckffWOUX0n2ASKsz3jHbm94SXjCyz2RnlLfcq3UxZNud3Jai1EpD2CT8uw51XKJjGPgZXHuHdI10wWppNrdCnmT4SS1evj6MDHfxjRJXn5D8&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3] 黄尧. 新马华人志[M]. 上海: 明鉴出版社, 1967: 178.
- [4] 廖文辉.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机制[J/OL].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 22-28(2012-08-14) [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GESPC9cB7bejfb-n0A3JU0iJ8PHzcWH1tFnNyBhJ5mp2i4X-ivbVJNggj3A3rfwhS5GaXokSyyTHlocQxW8nWmCt4oJD00k3plrQ8EvErt2DJuz85Rg6GF7Irp-hlGP1-hYYSgphW0PHEBX0fMzLmAsn2ZXJGHNJELr0mZfJvmpaegm5yNJd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5] 纳吉颁发文遗证书, 古庙游神列州政府日历[N]. 星洲日报, 2012-2-13.
- [6]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Malaysia population[EB/OL]. [2025-02-08]. <http://pqi.stats.gov.my/>

result.php?token=dc8cf2810e9328de7c597e7edbcdbc70.

- [7] 马戎. 民族社会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61.
- [8] 林苑莹. 传统的再生: 中国文学经典在马来西亚的伦理接受[D/OL].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FK0c0P8Ln1xaurs18h6AFFi013gGRoRdYaJUjonLo4Z49V73rIyY16-YgRXD3k82NX6pApXeQ6u--Ltm91Nrf3R--PwLmRVKx93-4QbBgHJ9Vdc09Hs8PT16j2Qyna0UMxNNxih5cv9tvNPChj-SpWtBdMEFM-LfshbcUXHhhat3q6kAIj9t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9] 彭伟步.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功能定位与跨族群角色转型[J/OL]. 东南亚研究, 2019(02): 139-153+158(2019-04-25) [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Eb7P1G1YA5cCLp0srgBuwkRY0x9arqmdVPawgw-rFR2d-vA-9MiDoIvNBNGeNWUJGZdsMsIK5BGqJK-FGkMyavok0B2nBo19yphLcMP2GED-b3aJwAUg646I2lyhWwNWh1BzBGq2d970kSBIX7kqFyB7hfXPpx-PdWt1UdXzR1TEmSEfa5002&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88.
- [11] 刘宏. 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变迁与挑战[J/OL]. 东南亚研究, 2012(06): 66-72(2013-02-05) [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Gw1qR-iz-4CPKzxQfSngs-d71sbA6iSXhZIpsT77P0jHhf0r0QLNICgpt420ouHbWf0R7sjjkfF6NM1cubShPg2nsx5z0IqWeKRUR1YYkSi8JmuRfRiUIAgkMBxQXEdWTWxEmVLqq1RXveIMmc5Mrj69-7ZIVc8cPb7K1Hm3QHCVi66fZ0uVE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12] 曹云华. 变异与保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360.
- [13] 沈庆利. 论“海外”语境下的“文化中国”[J/OL].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5): 42-47(2014-11-06) [2025-02-08].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Zlcs-hjNidFDoxV2veffWBEH1mp3EY588x-jIe7BddDvQnkpUPurPq91MSMOZiXK1XwdtDGL5v9xWwGa8pyY3xnNZHD6WkUZEextxHa6np6ex-BptH-Xis4t1Q-h70yRAji-GEuPv89YD3ffXn69Uba1C203FN9B1pdz1YqBu0iJ1bDdUrIZQ1Xt3-IX-VYv&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白丹妮(1993.11-), 女, 回族, 广西桂林人,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马来语教师, 马来语系主任,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来文学、马来西亚文化、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